积极接触与消极接触对群际关系的影响*

赵鹤宾　王昌成　夏勉　王旭杰

（青少年网络心理与行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湖北省人的发展与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武汉 430079）

摘　要　群际接触研究中存在的"积极偏向"阻碍了对群际接触的全面认知，因而，近年来消极接触开始被纳入研究之列。当前的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研究以问卷法为主，另外还涉及内容分析、社会网络分析以及实验法。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分别会提升和恶化群际关系，群际情绪、群际信任在其中起中介作用，权威主义、亲密性起调节作用。在积极接触效应和消极接触效应的关系上，存在不对称性检验和交互作用检验两种研究思路，并均得到了实证研究证据的支持。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考察不同效价接触，尤其是消极接触的泛化效应，拓展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的效应范围，完善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的作用机制，并进一步探索影响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不对称性效应的因素。

关键词　积极接触；消极接触；积极偏向；不对称效应；交互效应

引言

群际接触理论是近 70 年来社会心理学中最具影响力的理论之一，以此为基础的大量研究表明不同社会群体间的直接或间接接触都可有效改善群际关系，且具有跨群体和跨文化一致性(Lemmer & Wanger, 2015; Miles & Crisp, 2014; Pettigrew & Tropp, 2006; Zhou, Page-Gould, Aron, Moyer, & Hewstone, 2018; 李森森，龙长权，陈庆飞，李红, 2010)。然而，也有研究发现随着群体间接触的增多，偏见并没有显著地减少，反而是保持着原有的水平甚至于增加(Barlow et al., 2012)。究其原因并非是群际接触无助于群际关系的改善，而是由于现实生活中不仅有积极接触，也存在消极接触(Paolini, Harwood, & Rubin, 2010)。消极接触会对群际关系产生消极影响，并削弱积极接触效应(Aberson, 2015; Techakesari et al., 2015)。但是，出于降低群际偏见、提高群际态度的考量，先前的群际接触研究主要关注积极接触对群际关系的影响及其**中介机制和调节机制**，而忽视了消极接触研究(Pettigrew & Tropp, 2011)，这种"积极偏向"限制了对群际接触的全面认知。此外，在当前跨区域和跨国人口流动加快的大背景下，人们与外群体成员（如户籍界定的外地人、来华留学生）的接触机会越来越多，这在增加群体间积极接触频率的同时，也增加了消极接触的频率(Koopmans & Veit, 2014; Pettigrew, 2008)。因此，只关注积极接触对群际关系的影响显然与现实不符。鉴于此，Pettigrew(2008)呼吁群际接触研究者需加强对消极接触的研究。近十年来，国外研究者针对

收稿日期：2018-12-06
*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6ZDA232)。
王昌成为共同第一作者。
通信作者：夏勉, E-mail: xiamian@mail.ccnu.edu.cn

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对群际关系的影响开展了大量实证研究，而国内有关研究却很少。本文在梳理已有文献的基础上，首先，总结了积极和消极接触的研究方法；其次，阐述积极接触效应和消极接触效应，尤其是消极接触效应的**中介机制和调节机制**；然后，基于“相加模型”及“交互模型”述评了积极-消极接触的不对称效应和交互效应研究；最后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1　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的研究方法

1.1　问卷法

当前的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研究主要采用问卷法，在实证研究中有四种不同的测量思路。第一，采用形容词评定法让被试评估在与外群体成员互动时的感受，以此作为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经验的测量指标。例如，在 Árnadóttir，Lolliot，Brown 和 Hewstone(2018)的研究中，研究者让被试评估当遇到一个外群体成员，其在多长时间内会感受到：积极-消极、平等-不平等、合作-竞争、友好-不友好，以此来量化考察被试的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经验。第二，通过让被试报告与外群体成员的积极互动（被外群体成员帮助）或消极互动（被外群体成员打扰）频率来测量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Meleady & Vermue, 2019; Pettigrew, 2008; Reimer et al., 2017)。比如，Reimer 等人(2017)在测量积极接触时采用“支持”、“帮助”、“赞赏”、“友好扶持”、“受欢迎”五个条目，在测量消极接触时采用“辱骂”、“恐吓”、“威胁”、“嘲笑”、“不被需要”五个条目，通过让被试报告与外群体成员接触时有过上述接触的频率来量化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

Hayward，Tropp，Hornsey 和 Barlow(2017)在借鉴 Stephan，Stephan，Demitrakis，Yamada 和 Clason (2000)的测量项目以及考虑最佳接触条件的基础上，对上述两种方式进行了整合，这是第三种测量思路。该研究编写了 69 个项目，其中 37 个项目测量积极接触经验，32 个项目测量消极接触经验。在具体作答时，研究对象首先报告是否有过这些经历，如果有，继续评估这些接触经验的数量与效价。随后，计算接触数量和效价的均数，两者相乘即是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分数。研究结果表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效度，而不足之处在于无法提供信度(Hayward et al., 2017)。

Barlow 等人(2012)对采用具体接触事件来测量接触效价的方法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接触经验是一个多层面的现象，不能用单个接触事件代表，应该让研究对象对接触经验的效价做整体评估，这是第四种测量思路。Barlow 等人(2012)的研究使用两个项目分别测量被试的积极接触经验(“平均来看，你与外群体成员的积极(正面)接触有多频繁？”)和消极接触经验(“平均来看，你与外群体成员有消极(负面)接触有多频繁？”)。后续同类研究也多借鉴这种方法进行测量(Bagci & Gungor, 2019; Laurence, Schmid, & Hewstone, 2018; Meleady, Seger, & Vermue, 2017; Techakesari et al., 2015)。虽然，有研究者对采用单一项目测量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提出质疑，认为其可能会出现较大的测量误差(Techakesari et al., 2015)，但已有研究表明两个项目均具有较好的预测效度(Barlow et al., 2012; Techakesari et al., 2015)，因而可以认

为其具有可靠性(Bergkvist & Rossiter, 2007)。

1.2　内容分析法

采用自我报告的方法来让被试直接报告主观感知的积极接触或消极接触不可避免的会受到被试特征以及社会称许性的影响，而内容分析法可以弥补这一不足，因为这种方法是让被试根据特定问题回忆与外群体的接触经历，不需要被试直接对接触效价进行评估(Graf, Paolini, & Rubin, 2014)。在实际操作中，被试首先要通过回答三个问题来回忆并描述他们的接触经验：你能回忆任何与外群体成员接触的经历吗？这个外群体成员在那个情景中的行为表现如何？你是如何表现的？之后，由独立评分者根据相应的编码手册分析被试的接触经验，并将其编码为积极接触、消极接触以及中性接触(Graf, Paolini, & Rubin, 2019)。另外，研究者还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被试描述的接触情景或接触伙伴对群际态度的影响(Graf et al., 2014)。

1.3　社会网络分析法

上述两种方法均存在一定的局限。例如，群际接触本质上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但以上两种方法所测量到的是单向的积极接触，即仅能获知群际接触一方所感知到的积极接触，并不能知晓另一方是否也将这种接触同样感知为积极接触。更重要的是，测量项目会凸显群体身份(测量项目中包含外群体成员的身份，如黑人，移民等)，这可能会引发对外群体的消极反应(Wölfer et al., 2017)。而社会网络分析法(social network analysis)可弥补上述不足。通过社会网络分析，研究者可以得到内外群体成员间双向的友谊关系，而且由于这种方式不强调群体成员的身份(群体成员身份在人口学信息中已经收集)，可以将由测量项目引发的对外群体的消极反应最小化(Wölfer et al., 2017)。鉴于此，社会网络分析法近年来开始被应用到群际接触研究中(Wölfer, Faber, & Hewstone, 2015)。例如，在 Wölfer 等人(2017)的研究中，研究者首先采用同伴提名构建社会网络，要求每个学生列举自己最好的朋友(上限 10 个)，以此形成友谊网络。由于之前已经收集了学生的背景信息，所以可以明确内外群体成员的身份，在友谊网络中内外群体成员间的友谊关系数量代表着积极接触。在评估消极接触时，同样采用同伴提名法，让每个学生根据“你最不愿意和谁待在一起？”(研究 1)、“谁有时候对你最不友好”、“谁有时候对你最坏？”(研究 2 和研究 3)等相关问题提出 5 名或 10 名同学，与外群体成员消极关系的数量总和即为消极接触。

1.4　实验法

除上述三种方法外，还可采用实验法对接触效价加以操纵。然而，由于现有研究较少采用实验法去考察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的群际关系效应，因而有关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的实验研究并未出现稳定的研究范式（想象接触除外）。

在直接接触实验研究中，目前常用的实验操作主要有以下两种：第一，通过操作实验任务类型，安排被试与外群体成员进行合作学习或竞争学习以诱发相应的积极接触或消极接触(Desforges et al., 1991)。第二，通过操纵实验同盟者(假被试)的非言语行为诱发相应的

积极或消极接触。例如，在Paolini等人(2010)的研究中，研究者通过操纵同盟者(假被试)的非言语行为让被试体会到温暖放松(积极接触)或疏远紧张(消极接触)或两种感受均没有(中性接触)。而且为了使实验同盟者展现的非言语行为能诱发相应的接触体验，研究者根据Witt和Wheeless(2001)确定的非言语行为标准对同盟者进行训练。同时，为了让同盟者尽量不表现出与该群体相似的刻板印象，研究者让同盟者基于之前设定好的语言脚本与被试进行语言交流，以此控制额外变量的影响。

除采用实验法对积极和消极直接接触进行操纵外，还有研究对积极和消极的间接接触进行操纵。其中，在目前不同形式接触的实验研究中，想象接触(imagined contact)的研究范式呈现出相对稳固化的趋势。想象接触的情景操作设置积极想象接触组和消极想象接触组，两组采用不同的实验指导语，积极想象接触组的指导语是："请你花 1 分钟的时间想象自己第一次遇到了一个外群体成员，请你想象你们的交往是积极的、放松的、舒服的"，消极接触组的指导语是："请你花 1 分钟的时间想象自己第一次遇到了一个外群体成员，请你想象你们的交往是是消极的、紧张的和不适的"。为了增强想象任务实验效应，有研究让被试在 1 分钟想象任务之后写出想象的内容(Birtel & Crisp, 2012; Paolini et al., 2014)，也有研究要求被试在想象任务之后，回答如下开放式问题："这个人长什么样？"、"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使你感到这次接触是积极(或消极)？"(Paolini et al., 2014)。替代接触(vicarious contact)是另一种间接接触形式，是指让被试通过媒介接触不同效价的群际互动信息以诱发相应的接触体验。在 Joyce 和 Harwood(2014)的研究中，通过让被试观看内外群体积极接触或消极接触的纪录片以诱发相应的接触体验。类似的，新近的一项研究也通过让被试观看不同群体积极或消极的互相交流的视频，以诱发相应的接触体验(Andrews, Yogeeswaran, Walker, & Hewstone, 2018)。

综上，可看出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的研究方法趋于多元化，开始由单一的问卷法转变为多种方法并用。同一主题研究中多种方法的运用不仅增加了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研究结果的会聚效度，同时也可对已有研究方法之不足做出补充。例如，利用内容分析法不仅可以测量出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的频率，也可获得内外群体成员在真实群际接触情境中的情绪体验，从而更好地揭示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的情绪机制，而问卷法对群际情绪的测量通常是让被试在一个预想的群际接触情境中作答(Stephan & Stephan, 1985)，与真实群际接触情境中的情绪体验尚有差距。

2 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效应的中介机制及调节机制

2.1 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效应的中介机制

2.1.1 群际情绪

（1）消极情绪

已有研究发现，群际焦虑、群际愤怒、感知威胁等消极情绪在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效应中起到中介作用。群际焦虑是群际互动过程中的一种典型情绪反应。大量研究表明，积极接触可减少群际焦虑，从而产生积极的群际态度和群际行为(Pettigrew & Tropp, 2008)。那么，反之，消极接触是否会通过增加群际焦虑进而降低群际关系质量(Barlow et al., 2012)？Techakesari 等(2015)通过系列研究证实，在三个不同群际背景下(美国白人 vs 黑人、香港人 vs 大陆人、佛教徒 vs 伊斯兰教徒)，群际焦虑既能中介积极接触效应，也可中介消极接触效应。除群际焦虑外，群际愤怒也在群际接触对群际关系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Seger，Banerji，Park，Smith 和 Mackie(2016)的研究发现，积极接触越多，群际愤怒水平越低，群际态度就越积极。新近研究发现，群际愤怒不仅在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对群际态度、群际评价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还能够中介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对群际回避行为的影响(Hayward et al., 2017)。除此之外，感知威胁也可中介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效应，且具有跨群体、跨情境的一致性(Aberson, 2015; Kanas, Scheepers, & Sterkens, 2017; Rupar & Graf, 2018)。例如，Aberson(2015)在美国白人大学生样本上的研究发现，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分别通过减少或增加感知威胁来间接影响群际偏见，且感知威胁在消极接触与群际偏见之间的中介效应要大于其在积极接触与群际偏见间的中介效应。上述研究不仅将感知威胁作为一个高阶变量（包含象征威胁和现实威胁），考察其在不同效价接触效应中的作用，还分别检验并验证了象征威胁和现实威胁在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效应中的中介作用。此外，群际威胁的中介作用会受到群体地位的影响(Al Ramiah & Hewstone, 2013)。一项追踪研究发现，群际接触通过减少象征性威胁来提高少数群体对多数群体的评价，但象征性威胁在群际接触与多数群体对少数群体的评价间不起中介作用(Ramiah, Hewstone, Little, & Lang, 2014)。故此，未来研究需要在多个群际背景下分别考察两类群际威胁在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效应中的作用是否会受到群体地位等因素的调节，以提高研究结论的一致性。

（2）积极情绪

研究表明，共情、快乐、钦佩等积极情绪是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效应的中介变量。共情是积极接触减少群际偏见的重要情绪机制之一(Pettigrew & Tropp, 2008)，不同群体间的积极接触会增加共情，进而减少群际偏见。那么，是否可据此认为群体间的消极接触会通过减少共情，从而恶化群际关系？当前这一假设已得到实证研究的初步支持(e.g., Pagotto & Voci, 2013)。例如，Visintin，Voci，Pagotto 和 Hewstone(2017)在多数群体上的研究发现，消极接触会通过减少共情而增加群际偏见，Hayward 等人(2017)在少数群体样本上也验证了共情在消极接触效应中的中介作用。另外，近来研究表明，快乐这一积极情绪也会中介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对群际关系的影响，积极接触通过提高群际接触过程中的快乐水平进而改善群际关系，而消极接触则会降低快乐水平从而恶化群际关系(Hayward, 2014; Kauff et al., 2017)。

在共情和快乐这两种积极情绪之外，钦佩也是群际接触中所能体验到的积极情绪之一。Seger等人(2016)在美国白人-黑人、非同性恋-同性恋两个群际背景下均发现，积极接触越多，对外群体的钦佩水平越高，群际偏见水平越低，反之，消极接触越多，钦佩水平则越低，群际偏见水平就越高，换言之，钦佩可中介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对群际偏见的影响。

2.1.2 群际信任

除群际情绪外，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也可分别通过增加或减少群际信任(intergroup trust)进而影响群际偏见。群际信任是一个受到多学科关注的话题。在群际关系研究中，群际信任是指内群体成员对外群体成员积极乐观的预期(Lewicki, McAllister, & Bies, 1998)，反映了对外群体成员行为和意图的自信心和肯定性。群际信任会受到群际接触的影响，具体而言，积极接触会增加群际信任，而消极接触则会降低信任(Koopmans & Veit, 2014)。Pagotto 和 Voci(2013)的研究探讨了群际信任在积极接触效应和消极接触效应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意大利人与移民群体的积极接触，通过增加群际信任间接改善群际态度、减少群际偏见、降低对犯罪率的估计，而消极接触则通过减少群际信任恶化群际态度、增加群际偏见、提高对犯罪率的估计。另外，该研究还发现群际信任不仅中介消极直接接触对群际关系的效应，还能够中介消极间接接触（替代接触）对群际关系的影响。但也有研究发现，群际信任仅中介积极间接接触（拓展接触）对群际偏见的影响，在消极间接接触（拓展接触）和群际偏见间不起中介作用(Visintin et al., 2017)。这一方面说明群际信任在消极间接接触效应中的作用还有待更多研究证据的累积，另一方面群际信任的中介作用可能因间接接触类型的不同而不同。因而检验群际信任在间接接触效应，尤其是间接消极接触效应时，应严格明确不同类型间接接触的内涵或操作性定义，并据此进行测量或实验操纵。

积极和消极接触效应中介机制研究除了有利于探明积极和消极接触效应的路径外，也为群际关系的改善多提供了一种思考方式。例如，可以通过有意识地引导和教授不同群体成员情绪调节策略、提升情绪调节能力，以弱化不良情绪在积极和消极接触与族际关系之间的桥梁作用。

2.2 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效应的调节机制

2.2.1 权威主义

社会支配取向(social dominance orientation)和右倾权威主义(right-wing authoritarianism)是较为全面描述权威主义人格的两个维度(Altemeyer, 1981；转引自李琼，郭永玉，2007)，且两者和群际偏见密切相关。其中，社会支配取向反映的是个体期望内群体优于外群体或者支配外群体的程度。不同社会支配取向的个体对外群体持有不同的态度，相较于低社会支配取向个体，高社会支配取向个体对外群体持有更加消极的群际态度(Dhont, Hodson, Costello, & Macinnis, 2014; Kteily, Ho, & Sidanius, 2012)。据此研究者检验了社会支配取向对积极接触效应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与低支配取向的个体相比，积极接触更能有效地减少高社会支配取向个体的群际偏见(Kauff, Schmid, Lolliot, Al Ramiah, & Hewstone, 2016；Kteily, Hodson,

Dhont, & Ho, 2017)。Dhont 和 Van Hiel(2009)考察了社会支配取向在积极和消极两种效价接触效应中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较之于高支配取向个体，低支配取向个体在积极接触后偏见水平更低，而在消极接触后，高支配取向个体的偏见水平高于低支配取向的个体。另外，一项来自国内的新近研究在维吾尔族和汉族群体上也证实了社会支配倾向可调节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对群际接触意愿的影响(Wang, Huang, Sofia, & Vezzali, 2019)。具体而言，在汉族样本上，积极接触显著预测高社会支配取向汉族个体的积极行为倾向，消极接触显著预测高支配取向汉族个体的消极行为倾向；在维吾尔族样本上，社会支配取向对于积极接触效应的调节作用不显著，但对于消极接触效应的调节作用是显著的，消极接触显著预测高支配取向维吾尔族个体的消极行为倾向。

除社会支配倾向外，右倾权威主义也是权威主义人格的典型标志，包含权威主义服从、因袭主义和权威主义攻击三个成分(李琼，郭永玉，2007)。不同水平的权威主义个体对外群体持有的偏见不同，相对于低权威主义，高权威主义的个体对外群体持有更高的偏见(Weise, Arciszewski, Verlhiac, Pyszczynski, & Greenberg, 2012)。在此基础上，研究发现，权威主义可调节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效应。比如，Dhont 和 Van Hiel(2009)研究发现，积极接触显著负向预测高权威主义个体的种族偏见，而对低权威主义个体种族偏见的预测不显著，反之，消极接触显著正向预测高权威主义个体的种族偏见，对低权威主义个体种族偏见的预测不显著。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需进一步探索为何社会支配倾向和右倾权威主义调节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效应，即进行有中介的调节分析。从理论上这将有利于深化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效应的**中介和调节机制**研究，从实践角度而言，这可为降低群际偏见提供中间路径。

2.2.2 亲密性

先前研究表明群际关系中内外群体成员关系的亲密度可调节积极接触对群际关系的影响。例如，Wright，Aron，Mclaughlinvolpe 和 Ropp(1997)采用最简群体范式在美国大学生样本上发现，相比于低关系亲密度水平，当关系亲密度水平较高时，积极接触更能有效地改善对外群体的刻板印象。随后，以群际态度为因变量的研究也验证了这一结果(Wright, Aron, & Brody, 2008)。此外，诸多研究表明，相较于一般积极接触，跨群体友谊（高亲密度）能够产生更大的积极群际效应(Davies, Tropp, Aron, Pettigrew, & Wright, 2011)，这也为亲密度在积极接触效应中的调节作用提供了证据。新近研究表明群际关系亲密度对消极接触效应也会产生影响(Fuochi et al., 2019; Graf et al., 2019)。例如，Graf 等人(2019)以欧洲 5 国 1276 名大学生为被试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亲密性能够削弱消极接触对群际态度的消极影响。相对于经历过消极接触且与外群体成员关系亲密度较低的个体而言，经历过消极接触但与外群体成员关系亲密度较高的个体对外群体成员持有更积极的态度(Graf et al., 2019)。上述研究在实践层面的启示意义是：由于消极接触在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除了增加不同群体成员间的积极接触数量外，增加不同群体成员间关系的亲密度进而减弱消极接触对群际关系的消极影

响也是一种可行的方法，例如组织聚餐和结伴旅游。

基于以上回顾与分析，**当前对消极接触效应的中介和调节机制的研究思路**是直接从反面迁移积极接触效应的机制研究，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揭示消极接触效应的**中介和调节机制**，推进消极接触研究。然而，这种做法缺乏理论贡献和创新，因为这实质上是在相反的方向上重复积极接触效应的**中介和调节机制**研究。而且这种做法通常默认的一个前提条件是：积极和消极接触是一个连续体的两极，但这并未得到实证研究的支持。已有的同时测量积极和消极接触的研究发现，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呈低度相关，换言之，二者并非一极两端，而是相对独立的两个维度(e.g., Reimer, 2017; Wölfer et al., 2017)。此外，也有学者指出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对群际关系的影响路径可能不同(Paolini, Harwood, Hewstone, & Neumann, 2018)。因此，消极接触效应**中介和调节机制**的研究不可完全依赖积极接触效应**中介和调节机制**的迁移，而应注重挖掘消极接触效应所特有的**中介和调节机制**，以此更好地明晰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的联系与差异。

3 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的不对称效应和交互效应

当前学界除了探讨积极接触效应和消极接触效应的**中介和调节机制**外，也亦开始关注关于积极接触效应和消极接触效应间的联系，且存在两种研究思路：一是比较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对群际关系影响的大小—不对称效应，二是检验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对群际关系的交互作用—交互效应。以下分别就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的不对称效应和交互效应展开论述。

3.1 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之不对称效应

研究表明“坏比好更强烈”(bad is stronger than good)，也就是说消极的刺激或信息相较于积极的刺激或信息对个体的影响更为强烈和持久，存在积极-消极不对称效应(Baumeister, Bratslavsky, Finkenauer, & Vohs, 2001)。国内学者李爱梅等人也发现相对于积极刺激，消极刺激对人的影响更强烈(李爱梅, 高结怡, 彭元, 夏萤, 陈晓曦, 2015)。那么，这种不对称效应是否可以迁移至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对群际关系的影响中？即，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对群际关系的影响除了在方向上相反，在强度上是否也有所差异？

Paolini 等人(2010)率先通过实验法和追踪研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实验中，将被试随机分配至积极接触组、消极接触组和中性接触组，通过操纵实验同盟者的非言语行为来产生积极接触或消极接触。结果表明，消极接触组被试所报告的群体身份显著性水平比积极接触组更高，随后的追踪研究中也验证了这一点。虽然该研究揭示了在群体身份显著性上存在“积极-消极接触不对称效应”，但群体身份显著性是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效应由人际层面泛化至群际层面的条件之一，并非可以直接用以衡量群际关系的结果变量。基于此，Barlow 等人(2012)以群际偏见为因变量进行了研究。该研究的两项子研究的结果均发现，消极接触对偏见的影响要强于积极接触对偏见的影响。这表明“积极-消极不对称效应”也存在于不同效价的接触对群际偏见的影响中。后续研究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对此进行了验证(Alperin, Hornsey, Hayward, Diedrichs, & Barlow, 2014; Cernat, 2017; Dhont & Van Hiel, 2009; Graf et al.,

2014；Hayward et al., 2017; Techakesari et al., 2015)。研究发现，无论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还是在东方文化背景下，当不考虑消极接触时，积极接触显著预测群际偏见，但将消极接触作为控制变量后，积极接触对群际偏见的预测就变弱(Techakesari et al., 2015)，这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积极-消极接触不对称效应”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另外，先前研究常以多数群体为研究对象去考察这种不对称效应，而 Hayward 等人(2017)以少数群体为研究对象，也证明了消极接触在预测少数群体对多数群体的态度及行为上要强于积极接触。

自我分类理论(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和感知契合原则(perceived fit principle)可用以解释“积极-消极接触的不对称效应”。根据自我分类理论，由接触外群体成员而改变对整个外群体的态度，需以该群体成员的群体身份显著性为条件(Brown & Hewstone, 2005)。换言之，群际接触效应要由人际层面泛化至群际层面，需要让个体感知到其所接触的外群体成员属于他所在的群体（高群体身份显著性）。多项研究证实，消极接触比积极接触更容易产生较高的群体身份显著性(Paolini et al., 2010; Paolini et al., 2014)。此外，根据感知契合原则，人们往往对外群体成员有消极的感知，而与外群体成员发生的消极接触与先前对外群体的消极感知较为一致(Reynolds, Turner, & Haslam, 2000)，这会引发更高水平的群体身份显著性。群体身份显著水平越高，接触效应更易由人际层面泛化至群际层面，效应也更大，因而消极接触对外群体偏见的影响要强于积极接触。

综上，消极接触效应强于积极接触效应既有理论依据，也得到了实证研究的支持。基于此，Barlow 等(2012)提出在群际接触研究中，应同时考虑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对群际关系的影响。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消极接触效应强于积极接触效应，但并不意味着积极接触不能助力群际关系的改善。研究发现，虽然在对群际关系的影响上，消极接触接触效应强于积极接触效应，但日常生活中积极接触的频率要远高于消极接触(Graf et al., 2014)，即在频率上存在积极-消极接触的不对称现象，这使得积极接触可一定程度上减弱消极接触效应，进而改善群际关系。

3.2　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之交互效应

当前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的不对称效应研究结果尚存在分歧。虽然有研究支持消极接触效应强于积极接触效应，但也有研究发现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在对群际偏见影响上并没有显著的差异(Mazziotta, Rohmann, Wright, De Tezanos-Pinto, & Lutterbach, 2015; Stark, Flache, & Veenstra, 2013)，甚至于是积极接触效应强于消极接触效应(Pettigrew, Tropp, Wagner, & Christ, 2011)。这意味着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对群际关系的效应可能并不仅是简单的相加关系，还可能存在交互作用。Paolini 等人(2014)在冲突和非冲突情景下通过三个实验研究对此加以系统检验，结果发现先前积极接触对当前消极接触具有调节作用。不过，Paolini(2014)等人的研究仅发现积极接触对于消极接触效应的“缓冲”作用，而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对群际关系的交互影响较为复杂，单一的缓冲效应并不能完全体现交互作用。例如，Birtel(2012)通过实验研究发现，先进行消极接触再进行积极接触比只有积极接触更容易改变对外群体态

度。这提示了除“缓冲”作用之外，还可能存在其他类型的交互作用。近年来，有学者近一步对不同效价接触的交互作用进行分解，提出了四种效应模式：(1)缓冲效应(buffering)，积极接触减轻消极接触效应；(2)促进效应(facilitation)，消极接触会增强积极接触效应；(3)毒化效应(poisoning)，消极接触减弱积极接触效应；(4)恶化效应(exacerbation)，积极接触增强了消极接触效应(Fell, 2015)。简言之，积极接触对消极接触的影响存在缓冲效应和恶化效应；消极接触对积极接触的影响存在促进效应和毒化效应。

Fell(2015)通过系列研究对上述 4 种效应模式进行验证。首先相关研究结果表明，积极接触会减弱消极接触对与外群体和解意向的影响(缓冲效应)；消极接触会增强积极接触对与外群体和解意向的影响(促进效应)。但是鉴于相关研究不能很好的分解缓冲效应和促进效应，且不能明确变量间的因果关系，Fell(2015)进一步采用追踪研究对上述结果加以验证，结果发现，时间 1 的积极接触会减弱时间 2 的消极接触效应(缓冲效应)；而时间 1 的消极接触会增强时间 2 群体间积极接触效应（促进效应）。新近研究除了验证了上述两种交互效应外，还验证了毒化效应和恶化效应。Árnadóttir 等人(2018)以 357 个冰岛人(多数群体)和移民到冰岛国的 101 个波兰人(少数群体)为被试考察了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对群际信任、群际倾向、犯罪率估计以及感知到的文化差异的影响。结果表明，对于多数群体而言，除感知文化差异外，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在其他所有变量上均存在显著的交互效应。对交互效应进行进一步分解发现了缓冲效应和促进效应的存在。在少数群体样本上，相对于报告较少积极接触的被试，报告较多积极接触的被试在消极接触后感知到更多的文化差异。而感知文化差异被认为是群际偏见的一种体现(Pettigrew & Meertens, 1995)。这意味着在少数群体中积极接触对消极接触存在恶化效应。此外，当消极接触较低时，被试报告的积极接触和感知到的文化差异具有显著的负相关，而当消极接触较高时，两者之间的差异不再显著，这表明了消极接触对积极接触存在毒化效应(Árnadóttir et al., 2018)。

总之，研究已初步证实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的交互效应，但对于交互效应的解读仍有需要注意的问题。例如，Fell(2015)研究显示积极和消极接触的交互效应并不具备跨群体的一致性。另外，群体规模也会影响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的的交互效应。对于多数群体来说，较多的研究验证了缓冲效应和促进效应。然而，对于少数群体来说，消极接触可能会对积极接触产生毒化效应，积极接触也可能对消极接触产生恶化效应。未来研究需要在更多群体、更广泛的接触情景下对交互效应进行验证。

在对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之不对称效应和交互效应研究进行回顾与分析的基础上，笔者认为，虽然积极和消极接触的不对称效应研究有助于群际接触研究者明晰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效应间的差异，与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的交互效应研究一样对于积极和消极接触研究具有推进作用，丰富了群际接触理论。但从实践角度来看，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的交互效应研究意义更为凸显，也更为必要。如前文所述，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在现实生活中均是存在的并分别对群际关系产生促进和阻碍作用，且这两种效价的接触效应之间是有关联的。对

于政府决策者而言，其所关注的是如何通过干预措施来提升群际关系质量，而交互效应的研究可助推这一目标的实现，例如，缓冲效应的研究启示和谐融洽群际关系的构建可通过增加不同群体成员的积极接触经验，以此来增大积极接触效应并抑制消极接触对群际关系的消极影响。虽然积极和消极接触不对称效应的相关研究实践意义有限，但是从理论而言，其可以作为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交互效应的解释之一。例如，消极接触之所以能够减弱积极接触效应，其原因之一可能就是因为在特定的群际背景下，消极接触对于群际关系的影响更大。从这个角度来讲，以上两种思路是存在联系的而非绝对的独立或对立，在实证研究中可同时加以考虑。

4 研究不足与展望

近年来，关于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的研究积累了一定的研究成果，这深化了对群际接触的认识，进一步推动了群际接触理论的完善与发展。未来还可从以下 4 个方面进行拓展。

第一，进一步考察不同效价接触，尤其是消极接触的泛化效应。Pettigrew(1998)指出，积极接触会通过三种路径产生泛化效应：首先，在某一特定情境下所产生的积极接触效应会泛化至其他情境中；其次，和某外群体成员接触所产生的积极接触效应会泛化至其所属的整个群体；最后，和某个外群体的成员接触后所产生的积极接触效应会泛化至其他未与之直接接触的群体中，即群体接触的次级转移效应。随后，元分析发现积极接触确实会通过上述三条路径产生泛化效应(Pettigrew & Tropp, 2006)。那么，消极接触是否也是如此？已有研究证实了消极接触在路径二上的泛化效应(Drury, Abrams, Swift, Lamont, & Gerocova, 2017; Meleady & Forder, 2018)，但对于消极接触是否能够通过其他两条路径产生泛化效应目前尚未得到一致结果。Brylka，Jasinskaja-Lahti 和 Mähönen (2016)发现爱莎尼亚移民(少数群体 1)与芬兰人(多数群体)的消极接触，会进一步降低其对俄罗斯移民的态度(少数群体 2)，即存在消极接触的次级转移效应。然而，另一项考察少数群体与多数群体的消极接触对另一少数群体态度的影响研究却并未发现消极接触的次级转移效应(Mähönen & Jasinskaja-Lahti, 2016)。另外，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在多数群体与少数群体的消极接触中发现了次级转移效应(Meleady & Forder, 2018)。既有研究结果的不一致提示今后需要更多的文化背景和群际背景下考察消极接触的次级转移效应，以明确该效应存在的边界条件。

第二，拓展积极和消极接触的效应范围。在群际接触领域，存在“偏见问题”的限制(Dixon, Durrheim, & Tredoux, 2005)，即大部分研究考察群际接触对偏见的影响，但是群际接触也会影响其他群际关系结果变量。鉴于此，不少学者呼吁研究群际接触对偏见以外其他群际关系结果变量的影响(Wright & Baray, 2012)。目前，研究较多的是不同效价接触对集群行为(collective action)的影响。已有研究表明，积极接触会促进多数群体为少数群体争取权益的集群行为，却阻碍少数群体为自身争取权益的集体行为；消极接触会减少多数群体为少数群体争取权益的集群行为，却会增加少数群体为其自身争取权益的集群行为(Hayward, Tropp, Hornsey, & Barlow, 2018; Reimer et al., 2017)。然而当前研究只局限在个别群际背景下，未来

需要进一步在不同群际背景进一步检验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对集群行为的影响。除集群行为外，未来同样需要进一步考察不同效价接触对政府政策的影响，比如对于多民族国家，考察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不同效价的接触是否会对政府政策产生不同的影响。

第三，进一步探索积极和消极接触效应的中介作用和调节作用。如前所述，已有不少研究探讨了积极接触、消极接触效应的中介与调节机制，但仍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就中介机制来说，未来可进一步细致地考察情绪的中介作用。比如，有研究将情绪分为短暂性情绪(episodic emotions)和习惯性情绪(chronic intergroup emotions)(Paolini, Hewstone, Voci, Harwood, & Cairns, 2006)。Kauff 等人(2017)研究发现，相较于积极接触，消极接触与短暂性愤怒和害怕的相关更加显著。另外，短暂性愤怒与害怕分别通过习惯性愤怒与害怕显著预测对外群体的回避行为。那么短暂性情绪和习惯性情绪在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与群体态度、偏见及行为之间是否起多重中介作用？这有待验证。对于调节机制，未来需探索更多的调节变量。比如，典型性，即所接触的外群体成员是否是其所在群体的典型代表，已被验证是积极接触效应的重要调节变量(Dovidio, Love, Schellhaas, & Hewstone, 2017)。未来研究需进一步探索典型性等变量在消极接触效应中的调节作用。此外，目前研究大多单独考察积极和消极接触效应的中介机制或调节机制，而接触效应本身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可能存在有调节的中介或有中介的调节这两种情况。例如，Vedder，Wenink 和 van Geel(2017)研究发现群体规模可调节群体焦虑在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效应中的中介作用。因而，未来研究需综合考察不同变量对积极和消极接触效应的影响，以期全面厘清不同效价接触的**中介和调节机制**。

第四，积极和消极接触的不对称效应研究结果不一致的解释。不对称效应到底偏向的是消极接触还是积极接触，已有研究结果还未达成定论。Graf 等人(2014)的研究初步发现，当被试将消极接触归因于接触对象时，会比归因于接触情景产生更强的消极效应。基于此，Graf 和 Paolini(2017)指出，产生不对称效应的并非是不同效价接触在起作用，可能人们的归因方式起的作用。因而，未来可从归因理论出发更为全面而深入地探讨不同归因方式对积极和消极接触的不对称效应的影响。另外，结果变量的不同可能也会影响积极-消极接触不对称效应。目前，以群际偏见为结果变量的研究大部分支持消极接触效应强于积极接触效应，然而一项以集群行为为因变量的研究，却发现了积极接触效应强于消极接触效应(Hayward et al., 2017)。因此，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的不对称性可能会随着结果变量的不同而不同，如集体行为、群际喜欢(like)、跨群体友谊，这有待今后研究的检验。

参考文献

李爱梅，高结怡，彭元，夏萤，陈晓曦. (2015). 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适应的不对称性及其机制探讨. *心理科*

学进展，*23*(4)，632–642.

李琼，郭永玉. (2007). 作为偏见影响因素的权威主义人格. *心理科学进展*，*15*(6)，981–986.

李森森，龙长权，陈庆飞，李红. (2010). 群际接触理论——一种改善群际关系的理论. *心理科学进展*，*18*(5)，831–839.

Aberson, C. L. (2015). Positive intergroup contact, negative intergroup contact, and threat as predictors of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dimensions of prejudice. *Group Processes & Intergroup Relations*, *18*(6), 743–760.

Alperin, A., Hornsey, M. J., Hayward, L. E., Diedrichs, P. C., & Barlow, F. K. (2014). Applying the contact hypothesis to anti-fat attitudes: Contact with overweight people is related to how we interact with our bodies and those of others.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123*, 37-44.

Altemeyer, B. (1981). Right-wing authoritarianism. Winnipeg: University of Manitoba press.

Al Ramiah, A., & Hewstone, M. (2013). Intergroup contact as a tool for reducing, resolving, and preventing intergroup conflict: Evidence, limitations, and potential. *American Psychologist*, *68*(7), 527–542.

Andrews, N. P., Yogeeswaran, K., Walker, M. J., & Hewstone, M. (2018). Effect of valenced vicarious online contact on out-group prejudice and perceived out-group variability: A study of online poker.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48*(10), 571–581.

Árnadóttir, K., Lolliot, S., Brown, R., & Hewstone, M. (2018). Positive and negative intergroup contact: Interaction not asymmetry.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48*(11), 784–800.

Bagci, S. C., & Gungor, H. (2019). Associations between perceived positive and negative parental contact and adolescents' intergroup contact experienc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69*, 76–86.

Barlow, F. K., Paolini, S., Pedersen, A., Hornsey, M. J., Radke, H. R., Harwood, J., ... & Sibley, C. G. (2012). The contact caveat: Negative contact predicts increased prejudice more than positive contact predicts reduced prejudice.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8*(12), 1629–1643.

Baumeister, R. F., Bratslavsky, E., Finkenauer, C., & Vohs, K. D. (2001). Bad is stronger than good.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5*(4), 323–370.

Bergkvist, L. & Rossiter, J. R. (2007). The predictive validity of multiple-item versus single- item measures of the same constructs.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44*, 175–184.

Birtel, M. D., & Crisp, R. J. (2012). "Treating" prejudice: An exposure-therapy approach to reducing negative reactions toward stigmatized groups. *Psychological Science*, *23*(11), 1379–1386.

Brown, R., & Hewstone, M. (2005). An integrative theory of intergroup contact.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37*(05), 255–343.

Brylka, A., Jasinskaja-Lahti, I., & Mähönen, T. A. (2016). The majority influence on interminority attitudes: The secondary transfer effect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contac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50*, 76–88.

Cernat, V. (2017). Trajectories of interethnic contact and prejudice in a four-waves study of Romanian teenager–

parent pairs.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43*(15), 2669–2687.

Davies, K., Tropp, L. R., Aron, A., Pettigrew, T. F., & Wright, S. C. (2011). Cross-group friendships and intergroup attitudes: A meta-analytic review.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15(4), 332–351.

Desforges, D. M., Lord, C. G., Ramsey, S. L., Mason, J. A., Van Leeuwen, M. D., ... Lepper, M. R. (1991). Effects of structured cooperative contact on changing negative attitudes toward stigmatized social group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0*(4), 531–544.

Dhont, K., Hodson, G., Costello, K., & MacInnis, C. C. (2014). Social dominance orientation connects prejudicial human–human and human–animal relation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61*, 105–108.

Dhont, K., & Van Hiel, A. (2009). We must not be enemies: Interracial contact and the reduction of prejudice among authoritarian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46*(2), 172–177.

Dixon, J., Durrheim, K., & Tredoux, C. (2005). Beyond the optimal contact strategy: A reality check for the contact hypothesis. *American Psychologist*, *60*(7), 697–711.

Dovidio, J. F., Love, A., Schellhaas, F. M., & Hewstone, M. (2017). Reducing intergroup bias through intergroup contact: Twenty years of progress and future directions. *Group Processes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 *20*(5), 606–620.

Drury, L., Abrams, D., Swift, H. J., Lamont, R. A., & Gerocova, K. (2017). Can caring create prejudice? An investigation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intergenerational contact in care settings and the generalisation of blatant and subtle age prejudice to other older people. *Journal of Community and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7*(1), 65–82.

Fell, B. (2015). The interaction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intergroup contact. (Unpublished doctori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Oxford.

Fuochi, G., Voci, A., Veneziani, C. A., Boin, J., Fell, B., & Hewstone, M. (2019). Is negative mass media news always associated with outgroup prejudice? The buffering role of direct contact. *Group Processes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 in press.

Graf, S., & Paolini, S. (2017). Investigating positive and negative intergroup contact: Rectifying a long-standing literature bias. In S. Vezzali & S. Stathi (Eds.), *Intergroup contact theory: Recent developments and future directions* (pp. 92–113). New York, NY: Routledge.

Graf, S., Paolini, S., & Rubin, M. (2014). Negative intergroup contact is more influential, but positive intergroup contact is more common: Assessing contact prominence and contact prevalence in five Central European countrie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44*(6), 536–547.

Graf, S., Paolini, S., & Rubin, M. (2019). Does intimacy counteract or amplify the detrimental effects of negative intergroup contact on attitudes? *Group Processes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 in press.

Hayward, L. E. (2014). Contact with an Alien race: An experimental test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intergroup contact on intergroup emotions and attitudes. Society of Australasian Social Psychologists Conference.

Hayward, L. E., Tropp, L. R., Hornsey, M. J., & Barlow, F. K. (2017). Toward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intergroup contact: Descriptions and mediator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contact among majority and minority group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43*(3), 347–364.

Hayward, L. E., Tropp, L. R., Hornsey, M. J., & Barlow, F. K. (2018). How negative contact and positive contact with Whites predict collective action among racial and ethnic minoritie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57*(1), 1–20.

Joyce, N., & Harwood, J. (2014). Improving intergroup attitudes through televised vicarious intergroup contact: Social cognitive processing of in-group and out-group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41*(5), 627–643.

Kanas, A., Scheepers, P., & Sterkens, C. (2017). Positive and negative contact and attitudes towards the religious out-group: Testing the contact hypothesis in conflict and non-conflict regions of Indonesia and the Philippine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63*, 95–110.

Kauff, M., Asbrock, F., Wagner, U., Pettigrew, T. F., Hewstone, M., ... Christ, O. (2017). (Bad) feelings about meeting them? Episodic and chronic intergroup emotions associated wi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intergroup contact as predictors of intergroup behavior.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8*, 1449.

Kauff, M., Schmid, K., Lolliot, S., Al Ramiah, A., & Hewstone, M. (2016). Intergroup contact effects via ingroup distancing among majority and minority groups: Moderation by social dominance orientation. *PloS one*, *11*(1), 1–29.

Koopmans, R., & Veit, S. (2014). Ethnic diversity, trust,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interethnic contact: A priming experiment.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47, 91–107.

Kteily, N., Ho, A. K., & Sidanius, J. (2012). Hierarchy in the mind: The predictive power of social dominance orientation across social contexts and domain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8*(2), 543–549.

Kteily, N. S., Hodson, G., Dhont, K., & Ho, A. K. (2017). Predisposed to prejudice but responsive to intergroup contact? Testing the unique benefits of intergroup contact across different types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s. *Group Processes & Intergroup Relations*, *22*(1), 3–25.

Laurence, J., Schmid, K., & Hewstone, M. (2018). Ethnic diversity, inter-group attitudes and countervailing pathway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inter-group contact: An analysis across workplaces and neighbourhood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36*(2), 719–749.

Lemmer, G., & Wagner, U. (2015). Can we really reduce ethnic prejudice outside the lab? A meta-analysis of direct and indirect contact interven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45*(2), 152–168.

Lewicki, R. J., McAllister, D. J., & Bies, R. J. (1998). Trust and distrust: New relationships and realiti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3*(3), 438–458.

Mähönen, T. A., & Jasinskaja-Lahti, I. (2016). Ramification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contact experiences among remigrants from Russia to Finland. *Cultural Diversity and Ethnic Minority Psychology*, *22*(2), 247–255.

Mazziotta, A., Rohmann, A., Wright, S. C., De Tezanos-Pinto, P., & Lutterbach, S. (2015). (How) does positive and

negative extended cross-group contact predict direct cross-group contact and intergroup attitude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45*(5), 653–667.

Meleady, R., & Forder, L. (2018). When contact goes wrong: Negative intergroup contact promotes generalized outgroup avoidance. *Group Processes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 *22*(5), 688–707.

Meleady, R., Seger, C. R., & Vermue, M. (2017). Examining the role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intergroup contact and anti-immigrant prejudice in Brexit.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56*(4), 799–808.

Meleady, R., & Vermue, M. (2019). The effect of intergroup contact on solidarity-based collective action is mediated by reductions in SDO.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49(5), 307–318.

Miles, E., & Crisp, R. J. (2014). A meta-analytic test of the imagined contact hypothesis. *Group Processes & Intergroup Relations, 17*(1), 3–26.

Pagotto, L., & Voci, A. (2013). Direct and mass-mediated contact: the role of different intergroup emotions. *Testing Psychometrics Methodology in Applied Psychology*, *20*, 365–381.

Paolini, S., Harwood, J., Hewstone, M., & Neumann, D. L. (2018). Seeking and avoiding intergroup contact: Future frontiers of research on building social integration. *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 12(12), e12422.

Paolini, S., Harwood, J., & Rubin, M. (2010). Negative intergroup contact makes group memberships salient: Explaining why intergroup conflict endure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6*(12), 1723–1738.

Paolini, S., Harwood, J., Rubin, M., Husnu, S., Joyce, N., & Hewstone, M. (2014). Positive and extensive intergroup contact in the past buffers against the disproportionate impact of negative contact in the present.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44*(6), 548–562.

Paolini, S., Hewstone, M., Voci, A., Harwood, J., & Cairns, E. (2006). Intergroup contact and the promotion of intergroup harmony: The influence of intergroup emotions. In R. Brown & D. Capozza (Eds.). *Social identities: Motivational, emotional, and cultural influences* (209-238). Hove, E. Sussex: Psychology Press.

Pettigrew, T. F. (1998). Intergroup contact theory.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49*(1), 65.

Pettigrew, T. F. (2008). Future directions for intergroup contact theory and resear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32*(3), 187–199.

Pettigrew, T. F., & Meertens, R. W. (1995). Subtle and blatant prejudice in Western Europ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5*(1), 57–75.

Pettigrew, T. F. , & Tropp, L. R. . (2006). A meta-analytic test of intergroup contact theor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0*(5), 751–783.

Pettigrew, T. F., & Tropp, L. R. (2008). How does intergroup contact reduce prejudice? Meta-analytic tests of three mediator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8*(6), 922–934.

Pettigrew, T. F., & Tropp, L. R. (2011). *When groups meet: The dynamics of intergroup contact*.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Pettigrew, T. F., Tropp, L. R., Wagner, U., & Christ, O. (2011). Recent advances in intergroup contact theo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35*(3), 271–280.

Ramiah, A. A., Hewstone, M., Little, T. D., & Lang, K. (2014). The influence of statu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group contact, threat, and prejudice in the context of a nation-building intervention in Malaysia.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58*(7), 1202–1229.

Reimer, N. K., Becker, J. C., Benz, A., Christ, O., Dhont, K., Klocke, U., ... & Hewstone, M. (2017). Intergroup contact and social change: Implications of negative and positive contact for collective action in advantaged and disadvantaged group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43*(1), 121–136.

Reynolds, K. J., Turner, J. C., & Haslam, S. A. (2000). When are we better than them and they worse than us? A closer look at social discrimination in positive and negative domai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8*(1), 64–80.

Rupar, M., Graf, S. (2018). Different forms of intergroup contact with former adversary are linked to distinct reconciliatory acts through symbolic and realistic threat.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49*, 63–74.

Seger, C. R. , Banerji, I. , Park, S. H. , Smith, E. R. , & Mackie, D. M. . (2016). Specific emotions as mediators of the effect of intergroup contact on prejudice: findings across multiple participant and target groups. *Cognition and Emotion*, *31*(5), 1–14.

Stark, T. H., Flache, A., & Veenstra, R. (2013). Generalization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attitudes toward individuals to outgroup attitude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9*(5), 608–622.

Stephan, W. G., & Stephan, C. W. (1985). Intergroup anxiety.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41*(3), 157–175.

Stephan, C. W., Stephan, W. C., Demitrakis, K. M., Yamada, A. M., & Clason, D. L. (2000). Women's Attitudes Toward Men An Integrated Threat Theory Approach.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24*(1), 63–73.

Techakesari, P., Barlow, F. K., Hornsey, M. J., Sung, B., Thai, M., & Chak, J. L. (2015). An investigation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contact as predictors of intergroup attitudes in the United States, Hong Kong, and Thailand.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46*(3), 454–468.

Vedder, P., Wenink, E., & van Geel, M. (2017). Intergroup contact and prejudice between Dutch majority and Muslim minority youth in the Netherlands. *Cultural Diversity and Ethnic Minority Psychology*, *23*(4), 477–485.

Visintin, E. P., Voci, A., Pagotto, L., & Hewstone, M. (2017). Direct, extended, and mass-mediated contact with immigrants in Italy: Their associations with emotions, prejudice, and humanity perceptions.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47*(4), 175–194.

Wang, C., Fei, H., Stathi, S., & Vezzali, L. (2019). Positive and negative intergroup contact and willingness to engage in intergroup interactions among majority and minority group members in China: The moderating role of social dominance orient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in press.

Weise, D. R., Arciszewski, T., Verlhiac, J. F., Pyszczynski, T., & Greenberg, J. (2012). Terror management and attitudes toward immigrants: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mortality salience for low and high right-wing authoritarians.

European Psychologist, *17*(1), 63–72.

Witt, P. L., & Wheeless, L. R. (2001).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teachers' verbal and nonverbal immediacy and students' affective and cognitive learning.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50*(4), 327–342.

Wölfer, R., Faber, N. S., & Hewstone, M. (2015).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in the science of groups: Cross-sectional and longitudinal applications for studying intra-and intergroup behavior. *Group Dynamics: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19*(1), 45–61.

Wölfer, R., Jaspers, E., Blaylock, D., Wigoder, C., Hughes, J., & Hewstone, M. (2017). Studying positive and negative direct and extended contact: Complementing self-reports with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43*(11),1566–1581.

Wright, S. C., Aron, A., & Brody, S. M. (2008). Extended contact and including others in the self:Building on the Allport/Pettigrew legacy. In U. Wagner, L. R. Tropp, G. Finchilescu, & C.Tredoux (Eds.), *Improving intergroup relations: Building on the legacy of Thomas F. Pettigrew* (pp. 143–159). Oxford, UK: Blackwell.

Wright, S. C., Aron, A., Mclaughlinvolpe, T., & Ropp, S. A. (1997). The extended contact effect: Knowledge of cross-group friendships and prejudi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3*(1), 73–90.

Wright, S. C., & Baray, G. (2012). Models of social change in social psychology: Collective action or prejudice reduction? Conflict or harmony? In J. Dixon & M. Levine (Eds.), *Beyond prejudice: Extending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conflict, inequality and social change* (pp. 225-247). New York, NY, U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Zhou, S., Page-Gould, E., Aron, A., Moyer, A., & Hewstone, M. (2018). The extended contact hypothesis: A meta-analysis on 20 years of research.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23*(2), 132–160.

The effects of positive contact and negative contact on intergroup relations

ZHAO Hebin ; WANG Changcheng; XIA Mian ; WANG Xujie

(*Key Laboratory of Adolescent Cyberpsychology and Behavior (CCNU), Ministry of Education; School of Psychology,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Key Laboratory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Mental Health of Hubei Province, Wuhan 430079,China*)

Abstract: Considering the fact that there is a 'positive bias' in previous intergroup contact research, negative contact has also been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simultaneously. Currently, questionnaire, content analysis and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experiment are the four main research methods used in research considering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contact. It is demonstrated that positive contact and negative contact exerted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s on intergroup relations respectively, which were mediated by intergroup emotion and intergroup trust, and moderated by

authoritarianism and intimacy. In addi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sitive and negative contact effects, two kinds of research ideas were employed, that is, asymmetry and interaction, both of which were supported by empirical evidence. In future research, it is necessary to examine the generalization effects of different valenced contact, especially negative contact, expand the effect scope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contact, perfect the mechanism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contact, and further explore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asymmetric effect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contact.

Key words: positive contact; negative contact; positive bias; asymmetry effect; interaction effect